

著者：賀威爾
譯者：申健羣
出版者：晨鐘出版社

書名：未來的世界

——沒有馬克斯與耶穌

評賀威爾的新革命理論

——兼評申健羣先生的中譯本

吳乃德

比較沙書和其他作品，似乎七等生有意「表現」。另一說法則見七等生背負隱遁角色的苦難所做見證。讀沙書之感情可體認主人翁一郎的死亡屬七等生兄弟的死亡一般。

(六)

隱遁角色的悲慘命運是我們個人存在的基本理由。關心人類苦難命運的七等生以此面貌出現實有邏輯線索可尋。熟知孟子「性善論」提出之意義的文學工作者，或許可將此線索規劃完成，所借深奧的文學創作理論及人類行為知識則非普通人所可論到一分，故不敢論。

(七)

將沙書從七等生已出版的作品中區分出來，絕對必要。

一、書 評

賀威爾 (Jean-François Revel) 是法國 *L'Express* 週刊的專欄作家。早年曾在墨西哥大學、佛羅倫斯大學教書。後來回到法國，在里耳及巴黎的公立中學講授哲學史、藝術史、法國文學及法國地理。他為人卓然不羣，曾寫過不少小冊子攻擊戴高樂為首的右派，對法共也不會假以辭色。

賀威爾早期的著作，喜愛譏諷甚於一切。他的第一本著作 *Pomquoy les philosophes* (*Why Philosophers?*) 對君臨法國知識界的哲學泰斗提出嚴厲的批評。第二本書 *Pour l'Italie* (*For Italy*) 是他在義大利講學四年所見所聞的記錄。該書揭穿一般人對義大利文化、藝術、生活方式及義大利男人的迷信。第三本書「論普盧」(*Sur Proust*) 是他比較受重視的一本著作。在書中，他反對傳統對法國文豪普盧作品的闡釋，而提出自己的新見解。

他的這些作品使得瑪莉·麥卡錫說他冷嘲熱諷的風格酷似蕭伯納。不過，賀威爾却缺乏蕭自我宣傳的本領，也不願像蕭一樣，在新聞記者面前扮演萬事通的角色。當然更沒有任何芭蕾舞星願意跟賀威爾生孩子。雖然賀威爾以其敏銳的觀察力，藉著一枝生花妙筆，指出了流行觀念之錯誤與現存體制之弊病，可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法國知識界對他的批評：賀威爾的貢獻充其量只是負面的。他似乎為反對而反對，從不提出正面的觀點。如果這是不好的、錯誤的，那麼怎樣才是好的、正確的？對於此，他總是三緘其口。

直到一九七〇年，他的這本 *Ni Marx, Ni Jésus* 出版，才大大修正了法國知識界對

他的批判。他在這本書中除了繼續對法國的左右派「左」諷「右」刺之外，同時也提出了一個理想的革命模型。除了嚴厲批評共產主義及民族主義的革命不算革命之外，同時也說明了何者才是真正的革命。事實上，正如作者在美國版的後記中所說的，本書的目的乃在重新界定革命的概念。自此書出版以後，賀威爾便不再只是消極的批評家，而是一有原創力的學者了。

賀威爾以他所習慣的小冊子風格，於本書的第一句話就點出了全書的主旨所在，並且立刻吸引住讀者。「二十世紀的革命只能發生在美國。它只能發生在那裏，並且它已經發生了……」他所說的革命，並不同於一般人認為的：革命就是以暴力推翻現存之政權。他認為一個成功的革命，必須滿足下列五個條件：

- 一、它必須對現存經濟、社會與種族關係中的不義提出批判。
- 二、它必須對管理不善所導致的物質與人力資源之浪費提出批判。
- 三、它必須對政治權力提出批判，譴責政治權力的來源、原則與使用。
- 四、它必須對文化，包括道德、宗教、信仰、風俗、哲學、文學、藝術等提出批判。
- 五、它必須對文明制裁（*civilization as sanction*）提出批判，或者主張個人自由。

意即成功的革命並不只是推翻現存的腐敗政權而已。它必須針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層面的每一弊端都提出批判與修正。而且更重要的，革命之後的社會必須在這些層面上都優於舊秩序。

由這些標準來看，在共產世界中，共產黨雖曾成功地奪取政權，不過革命却未曾發生。而且由於它的封閉性與極權統治，革命也不可能發生。而科技停滯不前、文化失去創新力的

西歐，除了緬懷昔日的光榮之外，是不可能發生革命的。至於落後的第三世界，除了永無休止的政變與騷動之外，要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新文明更是幻想。

依照作者對革命的定義，人類史上成功的、真正的革命只有一次。那就是十八、九世紀的產業革命，加上民主政體之出現，科技文明之誕生。這個革命改變了整個人類文明的面貌，解放了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道德的、哲學的。目前在美國發生的，則是人類史上的第二次的革命。

作者認為第二次革命必發生於美國，至少基於以下數點理由。第一，革命並非必須借助於暴力不可。事實上，歷史事實告訴我們，靠暴力起家的政權，最後亦須靠暴力維持新政權。單由功利之觀點來看，完全憑藉暴力做為革命的手段，乃是最愚不可及的。在極權體制下，反叛者任何暴力行為都將遭遇當權者更殘酷的報復。在暴力的使用上，現存政權無疑佔有較大的便宜。而在民主社會中，雖然人民使用暴力較為方便，但是暴力手段也因此失去其革命的衝擊力。一個社會愈容許不滿與抗議，暴力行動的政治效力就愈趨近於零。美國的民主體制，使得任何種類的抗議與改革成為可能，使得分歧份子不必借助於不但功効可疑並且易使革命目標迷失的暴力行動。

其次，革命不是推翻舊政權，而是文化，包括各層面的創新與新秩序的建立。由此點觀之，也似乎只有充滿生命力的美國才有此種革命的能耐。當西歐沉醉於昔日之榮耀的時候，美國却以其活潑的生命力，大無畏地走向未來。它在文學、科學、技術、美術、戲劇、舞蹈、社會關係、經濟結構方面不斷地創新，不斷地改革，不斷地創造出新文化。我們引用當代社會學大師所羅金（Pitirim Sorokin）的話，美國實在是掌握了全世界的創作性領導權（creative leadership）。

第三項有助於美國產生革命的條件是，美國有一獨立、自主的大眾傳播系統。它的大眾傳播系統不但免於政府之控制，同時也免於社會之壓制。大眾傳播客觀而公正地報導事實之責任，在美國社會是廣受尊重的。它的新聞從業員也從不懈怠揭發社會之弊端。水門事件記憶猶新。唯有先瞭解事實，改革才有可能。又如「外科醫生」、「二十二支隊」、「萬世巨星」這些電影，從沒聽說有任何軍事機關或宗教組織提出抗議。也唯有在自由的空氣中，創新才有可能。除此之外，美國大眾傳播之發達，尤其是電視，使美國之內各個不同的社會互相接觸、互相影響而結成一體。當黑豹黨領袖在電視訪問中大談他將如何飛到北越幫越共打老美的時候——這種報導在其他的民主社會中是不被容許的——全國民眾透過電視了解了（但不一定同情）他的想法。美國電視對示威、罷工、暴動的轉播，也使得全國人民經由面對面的接觸，由旁觀者成為介入者。當革命的訊息在美國出現，響應的不再是一小撮人，而是廣大的羣衆。

綜括言之，「美國最適宜做為成功革命的典範之理由如下：它享有繼續不斷的經濟繁榮與成長率，缺少這些，任何革命計劃都不能成功；它科技發達，基礎研究亦具有頗高的水準；文化上，它邁向未來，而不同首瞻望，行為標準與個人之平等自由的確認都在改變之中；它摒棄極權控制，它在各層面之創新——尤其藝術、生活方式、感官經驗——都急遽增加，它並且容許各種不同的次文化互相補足而並存。」（原書頁一八三）

最後，作者舉出一些現存於美國的一些現象做為革命已經發生的徵兆。這也是最值得商榷的地方。他認為美國青年的反叛行為，包括反戰運動、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反污染、消費者保護運動、嬉皮、熱門音樂等，都是革命已經發生之徵候。而隱藏於這些運動背後的基本精神，乃是對於價值的重估、毀棄與重建。可是，這些覺醒者的人數在總人口所佔之

比例很小。由他們所發動的不滿運動能否發展成作者理想中的革命，或甚至能否算是此種無所不包的大革命已經發生的徵候，實不無疑問。這只能留給未來的歷史學者去解答，目前尚難斷言。關於這一點，作者是過份樂觀了。

賀威爾的另外一個矛盾是，他將經濟成長與繁榮做為革命成功的要件於先，又將這些抗議份子做為革命的先鋒於後。如果這些「邊緣人」的數目過多，那麼美國的經濟將逐漸衰退，成長將歸於零。而如果他們的數目過少，那麼他們將永遠是反叛者、抗議者，不能成為社會之主流，以形成作者所說的革命。

因此，對於作者的結論，我們必須如此修正：

雖然我們不能斷然宣稱，革命已經在美國發生。也許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如果革命要發生的話，它必然發生在美國。

二、譯 評

據筆者所知，賀威爾這本 *Ni Marx ni Jésus*（英譯名 *Without Marx or Jesus*），目前國內有兩種翻譯版本。一種為申健羣先生所譯，書名為「沒有馬克斯與耶穌的未來世界」，由晨鐘出版社出版。另一譯本為新亞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新論」。譯名自以後者為佳，也較符合原著之內容。前者不但冗長，並且與內容不甚貼切。易使人誤會為有關未來學之著作。由於篇幅所限，手邊又無新亞的譯本，故只對晨鐘的譯本做簡要的評論。

申健羣先生的譯筆尚稱流暢，以國內翻譯界的水準而言，屬中上之作。申先生翻譯這本書的時候，仍是化學工程系的學生。學理工的人有心翻譯社會科學的著作，勇氣可嘉。不過

譯書單憑勇氣是不够的。它更需要毅力與虛心。所謂毅力就是遇到艱難處，不可草率、偷懶，更不可存僥倖之心，認為讀者也許不會發覺而乾脆將它刪除。所謂虛心，就是遇到不懂的專門術語，務必請教對該門學問學有專精的人，不可閉門造車，胡譯一通。例如 *mass culture* 一辭與 *mass society* (羣衆社會) 相關，可譯為羣衆社會之文化或簡譯為羣衆文化，但絕不能譯為「整體文明」(譯本頁二四)。*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是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絕不是「國家民主會議」(頁一一八)。*Referendum* 是全民投票，不可譯成「否決會議」(譯本頁一一〇)。*Sorbonne* 是巴黎大學，不宜譯成「索邦」(頁一八)。

原文書中附有作者寫的美國版序言，及瑪莉·麥卡錫執筆的後記，將近三十頁。這些文字對讀者而言極富參考價值。可是却被譯者捨棄，而代之以一篇長達六頁、半生不熟的箴言或譯序。這未嘗不是本書的一大敗筆。

另外，譯本扉頁有「謹將此書獻給父母親」字樣，沒有註明是作者獻給他父母親的，還是譯者。使得讀者弄不清楚到底譯者比較孝順還是作者。這些都是應該交代清楚的。

筆者將原文與譯本大概對照過後，感到最痛心，最難以忍受的，還是原文被刪除得慘不忍睹，全書經過修剪的地方，至小有二十餘處。有些是前半句還在，後半句就不見了，有些前半段在，後半段失蹤。有些則是整段、整頁不見的，甚至一刀砍掉整整八頁的。其豪放，令人欽佩；其殘酷，令人切齒。例如譯本四十六頁第一段後半段不見，接下來的一段整段失蹤。二十四頁第三段整段不見。八十四頁第一段只譯第一句的前半句，以後一概刪掉，而代之以「……」，此種譯法，倒是非常方便。以下的三頁全部失蹤。然後又忽然由新段的中間繼續接上去。真的是揮來斬去，隨心所欲。第八十五頁第一段之後刪掉八頁半，約三千字，

譯成中文更不只此數。同頁第二段之後，刪掉整整四頁。一〇八頁第一段後半段失蹤，第二段與第三段中間一整段失蹤，最後一段只譯出第一個句子（並且譯錯），以下的一整頁失蹤。一二四頁第二段整段失蹤，約五百字。最後一段後半段不見，約六百字。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前衛藝術家姓名，影片導演、戲劇等。此種例子不勝枚舉，似乎只要是礙手礙腳的地方，全部格殺勿論。這些不明不白遭殃的文字至少有數萬言。

操刀的不知爲何人。如果是譯者，那麼他辛苦翻譯本書的心血可說因此而完全白費。如果是出版商，那麼其經營方針就值得檢討了。晨鐘出版社給知識界的印象還不壞，營業情況似乎也不錯，故更應該兢兢業業，好好搞文化事業，以報答衣食父母，不要砸了這塊招牌。其次，我們談到專有名詞的翻譯問題。地名姓氏應該依該國語言音譯，不能以譯者熟悉其他的語言胡譯一通。

舉例言之，日本首都只能譯成 Tokyo，絕對不能譯成 Tungchin，山本只能譯成 Yamamoto，絕對不能譯成 Sanpoon。只懂中文不懂日文的洋鬼子也許就會這麼譯，正如凡看到 a. b. c. d 就以英文發音的國內翻譯界一樣。因此作者 Revel 譯成中文是賀威爾，而非「雷威爾」。Mittesand 只能譯成密特宏，不能譯成「密特蘭德」（三十頁）。法國散文家 Montaigne 舊譯蒙田，非常正確，譯者自作聰明，改譯爲蒙太因（六九頁），後來又譯成蒙太根（七二頁），兩種譯法都不對。美國民謠歌手 Joan Baez，她的名字應照法語譯爲芭耶，而非「白艾絲」（一一五頁）。

第九章的標題，原文是 From Freedom to Socialism，若譯成「由自由到社會主義」，簡單明瞭。申先生却譯爲「由政治自由到經濟自由」。對於何謂經濟自由，各人看法不一。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爲絕對保障個人私有財產權的資本主義才是經濟自由。社會主義者

書名：西湖的彼岸
著者：李歐梵

西湖中的弄潮兒

方知

認為將財產社會化才是經濟自由。如果直接譯為社會主義，就能免除這些觀念上的含糊。

譯文中稍嫌草率處也不少。reformist 譯為「保守主義份子」(二五頁)；doctoral ignorance 譯為「對學術的漠視」(七三頁，意為飽學之無知，只會死填知識無法自知識中吸取智慧與教訓，或可譏諷為「博士文盲」)。六六頁第二段有一句：我們不得不同意托克維爾對民主的分析，認為民主政治乃是一種生活方式，在民主政體肇建之同時，民主文明也創造出了「民主人」(homo democraticus)。缺乏民主人，民主體制就像農家裏的電冰箱，成為炫耀的裝飾品，從不插上插頭。譯文為：「民主政治是生活的一部份。民主精神是由文化造就出來的，但同時它也是民主團體的精髓。沒有這種精神的民主團體，就好像……」。不但把民主政治大理論家托克維爾的名字略去，democratic institution 譯成民主團體更是不通之至。至於，把 find their roots 譯成「掘出自己的根」(四五頁)，the dawning of a new era 譯成「新時機的消逝」(一一頁)則與原意剛好相反。

綜觀申先生的譯本，文筆尚稱通順流暢。如果譯者能够不偷懶，把被刪除的地方補進去；能够以嚴肅的態度翻譯，疑難處質諸高明，將錯誤的地方全部修正過來，那麼此譯本的可讀性就更高了。